

还“四人帮”以老右派 的本来面目

山东省革委文化局
创作办公室

4
1977

《文艺学习资料》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丑恶历史说明，他们本来就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王洪文则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所谓“四人帮”，就是由这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

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发批判“四人帮”，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当前的战役是集中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通过揭发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华国锋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
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
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42) 本书

目 录

- 三月的租界……………鲁迅 (1)
鲁迅批判张春桥之流的言论选辑…………… (4)

批 判 张 春 桥

揭开狄克们的反革命嘴脸

- 重读鲁迅杂文《三月的租界》……………石冶弓 (11)
鲁迅痛打落水狗张春桥……………鲁迅研究室大批判组 (18)
从《俺们的春天》看张春桥的反动嘴脸……………文汾平 (22)
张春桥是蒋介石的吹鼓手……………卫 今 (26)
一个日本走狗的供状……………
——评张春桥的反动文章《济南》……………
……………山东大学大批判组 (31)

一个老反革命的自供状

- 评张春桥三十年代中期的黑作品……………
……………吉林省图书馆大批判组 (37)

批 判 江 青

- 江青三十年代的三次反革命表演……………鲁迅研究室 (44)
从争演赛金花到为蒋介石祝寿……………
——揭开老投降派江青的真面目……………
……………文物出版社批判组 (49)

最无耻的汉奸理论

——斥江青一九三七年的黑文《三八妇女节》

.....立军 泽清 (54)

批判姚文元

姚文元是个尊孔派.....邢福石 (57)

褫其华衮 示人本相

——评姚文元的尊孔言论及其它

.....柯文平 (61)

附 录

张春桥的反动文章(供批判用).....

俺们的春天..... (69)

济 南..... (72)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80)

张春桥向鲁迅反扑的信..... (83)

也是文学管见..... (85)

纪念九一八..... (86)

韩复榘..... (87)

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 (93)

坚持工农兵方向..... (101)

把根扎深一些..... (108)

关于现代题材剧目的问题..... (116)

张春桥其它文章中的反动言论摘录..... (125)

江青的反动文章(供批判用)

演员独白（节录）	(132)
为自由而战牺牲	(133)
三八妇女节	(135)
“四十年代”与“业余剧人”争演赛金花纠纷的经过	
“业余”招待记者解释一切	(137)
么哥：见闻偶记——蓝苹将演赛金花	(139)
蓝苹一九三六年参加为蒋介石“购机祝寿”演出	
的情况（资料）	(140)
姚文元的反动文章（供批判用）	
漫谈“同”与“异”	(141)
一点补充	(144)
教条和原则（之二）	(150)
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153)
姚文元其它文章中的反动言论分类摘录	
（共十一类）	(155)
蒋帮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报》所载	
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	(170)

三 月 的 租 界

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醒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注：即张春桥）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

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

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胡胡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不克
（见《且介亭杂文末编》）

。个一各百只出焉。时泰漠不冰，国腐味国腐。

三武一）《‘美’的‘美出’。杂文末编卷个且》

（日十三民四零六）

事公而，不一息利愿半半。工隆郊早，前四月二十民四
前例表，计膏数不，息突数不，天降言，类生户困，事好
越不伏户香苑，伏户好景总出，下该县冀总录。官夫工好出
兹日也。击伐采南座不味印墨英。来疏社出世好，事紫计立
而，入贼言好，平前干登罪，学文函国舞，会树案非氏查里
罪，前英帝宣王会集查至甚，廿大案国不短长世好味印墨英

鲁迅批判张春桥之流 的言论选辑

我的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在《海燕》上公开发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评，但大抵自谦为“读后感”。于是有人说：“这是因为作者的名声的缘故”。话是不错的。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的受批评家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呀，“不该回来”呀（注：这是张春桥《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中的意思），“叽哩咕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然而别一方面，慷慨激昂之士也露脸了，他戟指大叫道：“我们中国有半个托尔斯泰没有？有半个歌德没有？”惭愧得很，实在没有。不过其实也不必这么激昂，因为从地壳凝结，渐有生物以至现在，在俄国和德国，托尔斯泰和歌德也只有各一个。

《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日）

四月十一日的信，早收到了。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签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却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

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注：即《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消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

《致王治秋信》（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

我们的学者也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近如东三省被占之后，听说北平富户，就不愿意关外的难民来租房子，因为怕他们付不出房租。在南方呢，恐怕义军的消息，未必能及鞭毙土匪，蒸骨验尸，阮玲玉自杀，姚锦屏化男的能够耸动大家的耳目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蝥蛄，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

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辨，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他们横竖就要消灭的，然而刺之者，所以偶使不舒服，亦略有报复之意云尔。

《致郑振铎信》(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而“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漫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在

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糊涂的昏虫。

《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

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

战线问题》（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

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

战线问题》（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

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这和商人的专卖不同，并且事实上你们先前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也并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过册。……自然，我还得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无误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之关系。——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

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没有邀请徐懋庸们来参加议讨。但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如果人不用脚底皮去思想，而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不能随便说句“标新立异”就完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这样的口号，也是胡说！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
战线问题》（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
战线问题》（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

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

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一九三六年

夏）

“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象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一九三六年

夏）

敌国的田汉君被捕后又释放了，现在正为南京政府（当然，同时也为了艺术）而活动。这样虽也自由，不过据说在田君身上随时都围绕着正义与真理，这却又有些想不通了。

《致日本一作家信》（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

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致肖军、肖红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

日）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人物。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事。但

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

《致肖军、肖红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致肖军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海之所谓作家，鬼蜮多得很，……但是“作家”之变幻无穷，一面固觉得是文坛之不幸，一面也使真相更分明，凡有狐狸，尾巴终必露出，而且新进者也在多起来，所以不必悲观的。

《致杨霁云信》（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夏）

（日）

（日）

揭开狄克们的反革命嘴脸

——重读鲁迅杂文《三月的租界》

鲁迅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挥笔奋战，真是“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蠹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在那“毕现”的形形色色泉蛇鬼怪的嘴脸堆里，我们也见识了一副“狄克先生”的嘴脸：分明是扑人、咬人的叭儿狗，却扮着“公允”、“平正”的猫相；分明是一个跳梁小丑和投降派，却涂着“左翼”、“激进”的雪花膏。鲁迅以厌恶、愤慨的心情，写下了《三月的租界》这篇犀利的杂文，对狄克的丑行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鲁迅对狄克的批判，是有着重要典型意义的战斗。狄克是何许人也？不是别人，就是当前全国军民愤怒声讨的“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里的那个张春桥。今天，重温鲁迅《三月的租界》这篇著作，对于我们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识别那些钻进革命营垒里的“蛀虫”，识别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现在的狄克们，实在是益莫大焉！

狄克跳出来露脸的年代，是一九三六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全境已经四年多，并逐步侵入我华北地区。代表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顽固实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革命卖国

政策。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英雄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毛主席正确分析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彻底批判了统治全党四年之久，使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位青年作者从“荆天棘地”的东北回到“祖国”，出版了一本描写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事迹的小说《八月的乡村》。鲁迅热情称赞这部作品，为它写了序，指出这部作品的政治意义是“有碍”于侵略者的“心的征服”。鲁迅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和爱护青年、扶植新生事物的态度，是何等鲜明啊！然而，这却引起了狄克这个“不平家”的不平。

请看，狄克摆出一副“激进”的“革命”的“指导家”的架势，在一张反动文人编辑的《大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短评，对《八月的乡村》夹枪带棒，滥加指摘：什么作者“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小说“里面有些还不真实”，“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呀，如此等等。鲁迅十分辛辣地驳斥狄克：“如果是做随员”，“如果是剿匪”，因而回到“祖国”，他们是连个屁都不会放的；但是跑到上海出版了一本宣传抗日的书，他们竟要拒之于千里之外；并且“‘叽里咕噜’呀，群起而打之”。可是，狄克还假惺惺地声称：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所以才“要执行自我批判”。鲁迅严正回击道：“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如果在还有‘我们’和